

「延安日常生活」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課題，《延安》顯然是無法完全涵蓋的，延安的話語、節日、民主生活會……還有很多東西需要做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為了忘記。主觀意志上為了忘記，恰恰是客觀上不能忘記，生活中揮之不去。於是，人們改變記憶的顏色，用憎惡的顏色來表達仇恨的心理和厭棄的情緒，藉以維持人間道義，呵護善良美好的意願。」(頁185)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史料的豐富再加上語言的生動，就使得本書既有歷史的厚重感，又有文學的美感。當然，朱鴻召能做到這一點，與他的專業背景很有關係，他是華東師範大學畢業的文學博士，有着較為深厚的文字功底。

當然，《延安》也不是沒有缺憾的。書中有些論述過於簡單，只是蜻蜓點水。例如，〈工人有甚麼才來勁〉一文附論的第三點，作者僅僅指出「組織開展群眾運動的方式，

將工人改造成為生產模範、勞動英雄和政治標兵的單面人，將所有的社會資源都收攏在政治的掌握中，會帶來一些消極的後果。」(頁56)到底有甚麼樣的消極後果？沒有下文，作者的論述就戛然而止了。

另外，「延安日常生活」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課題，《延安》顯然是無法完全涵蓋的，延安的話語、節日、民主生活會……還有很多東西需要做進一步的深入研究，例如已為學者提出，但卻沒有得到應有關注的「延安語言」問題。應該說，「文革語言」是典型的「後延安語言」，是「延安語言」的延續和極端發展。

筆者期望朱鴻召以及其他學者在延安日常生活的研究方面能取得進一步的成就。

楊慶堃的(宗教)社會學研究

● 黃劍波



楊慶堃著，范麗珠等譯：《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與其歷史因素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中國宗教研究的聖經」，是歐大年(Daniel Overmyer)對楊慶堃《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與其歷史因素之研究》(*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以下簡稱《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引用只註頁碼)一書的高度

評價(序言,頁15)。且不論這個說法是否過譽,至少在近半個世紀以來,該書一直是西方學界了解中國本土宗教的基本參考書。然而,多年來該書一直沒有中譯本,這對多數中國學者帶來不小的困難,就是在涉及中國宗教時都會提到楊氏提出的「分散性宗教」這個概念,但卻對其具體意涵和整個論證過程不甚了了。因此,該書中譯本面世的意義是不言自明的,至少它迫使習慣於道聽途說的人必須老老實實地讀此書。

一 中國社會中的宗教是一種甚麼樣的宗教?

對楊慶堃來說,中國社會一直存在宗教,而且它廣泛地存在於社會各個領域,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因為中國人生活中受宗教影響是一個「無法否認、俯拾皆是的事實」(頁34)。宗教既存在於民眾的日常生活中,以社區的集體性活動為特徵;通過天命信仰,也使宗教與政治倫理結合在一起。楊氏所困惑的是:宗教在傳統中國社會的地位問題。對此,不少學者基本上認為,宗教主要是指類似基督教那樣的組織化宗教,而佛教、道教這樣的宗教在中國社會和道德秩序中是不重要的。楊氏意識到,這種觀點的出現,是因為在中國社會制度體系下缺乏一個正式的、組織化的宗教,而老百姓的儀式則被視為「非組織性的」(頁34)。

楊慶堃很不同意西方研究者以西方社會中的基督教為參照,所得出的對宗教在中國社會中地位的觀

察。事實上,儘管他對於韋伯的研究相當佩服,並曾為《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的英譯本撰寫了長達三十二頁的「導論」,認為此書「是研究中國社會和其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的富有挑戰性思想的來源」,但他卻無法接受韋伯對於中國宗教特徵的觀點——認為民間信仰是「功能性神靈的大雜燴」(Max Weber,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trans. and ed. by Hans H. Gerth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4], xiii)。在楊氏看來,這種觀點顯然不能準確地解釋中國宗教的實質。因為在中國,組織性宗教不夠強大,並不意味着在中國文化中宗教功能價值或宗教結構體系的缺乏;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楊氏指出:「簡單地將宗教運動作為普通民眾的迷信產物而不屑一顧,將無助於理解中國社會的性質。」(頁34)

楊慶堃對於近代中國學者關於中國社會「非宗教」的看法也極為不滿。他準確地指出,「[這些看法]部分地是對全球世俗化潮流的響應」;進一步,他認為,「有關中國社會『非宗教』與『理性化』的假設,中國知識份子或許還有更強的動機,因為面對西方世界政治和經濟上的優勢,惟有通過強調中華文明的偉大,才能滿足他們的心理需要。」(頁24)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楊氏自身對於中國宗教的合理性論證也存在類似的問題。儘管他試圖突破那種「東方學」的思路,但也同時落入了所有東方學難以避免的邏輯陷阱中,即仍然是在用西方的邏輯來論證東方的現實。

簡單來說,楊慶堃的思路大致是這樣的:中國社會有宗教嗎?

不少學者在涉及中國宗教時都會提到楊慶堃提出的「分散性宗教」這個概念,但卻對其具體意涵和整個論證過程不甚了了。因此,《中國社會中的宗教》中譯本面世的意義是不言自明的。

楊氏需要處理的問題，首先就是列舉大量的例證，說明中國社會中存在宗教這個事實，並論證宗教在中國社會生活中發揮了重要的功能，並且是社會生活與組織發展和存在的基礎。

有。宗教在中國社會有作用嗎？有。那麼，它怎樣起作用？如何解釋其在組織性宗教缺失或弱勢的情景下又確實在廣泛起作用？就這個問題，原有的概念似乎失去了解釋力。「分散性宗教」作為一個詮釋概念被納入楊氏的論證過程中。也就是說，楊氏需要處理的問題，首先就是列舉大量的例證，說明中國社會中存在宗教這個事實，並論證宗教確實在中國社會生活中發揮了重要的功能，並且是社會生活與組織發展和存在的基礎。更為重要的是，他需要解釋宗教的這些功能是以怎樣的結構形式來實現的。為此，他提出了一對他討論最多的概念：「制度性宗教」和「分散性宗教」。

需要注意的是，這對概念並不是神來之筆，而是楊慶堃對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的結構功能主義理論的擴展和應用。他認為正是帕森斯的「分散性」和「特殊性」的概念，為解決「宗教在傳統中國社會的地位問題」提供了一把鑰匙；而瓦哈 (Joachim Wach) 的結構性視角和蒂里希 (Paul Tillich) 的功能性視角，則為楊氏提供了重新界定宗教的思想資源。楊氏更直接借用了瓦哈的「相同性的自然團體」與「特殊性的宗教組織」這對概念 (參見 Joachim Wach, *Sociology of Relig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擴展成他認為可以更貼切地解釋宗教在中國社會中地位的一對概念。

楊慶堃認為，一種制度性宗教在其獨立存在中很容易被觀察到，但它在社會組織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能不那麼重要；另一方面，作為一個獨立的因素，分散性宗教可能並不那麼引人注目，但它作為一種基

層支持力量，對於世俗制度和整體的社會秩序或許十分有意義。總之，借助這對概念，楊氏將中國社會中的宗教特徵和相互關係歸結為：

在許多情況下，制度性宗教和分散性宗教相互依賴、互為表裏。分散性宗教依賴制度性宗教發展其神話的或神學理念，提供神明、精靈或其他崇拜的象徵，創造儀式和供奉方式，以及對信徒和出家人進行專門訓練。因此佛教和道教的信仰制度、神明、儀式及出家人被借用在分散性宗教的不同形式中，諸如祖先崇拜、民間神明以及道德—政治的崇拜儀式。另一方面，制度性宗教依靠為世俗制度提供上述服務以便維持其自身的存在和發展。因此，在中國社會的宗教生活中，這兩種形式的宗教結構在功能角色上相互關聯、影響。(頁269-70)

二 宗教視角下的社會

從《中國社會中的宗教》這個題目上來看，似乎楊慶堃的思路是希望在中國社會場景中理解宗教，就他所沿用的涂爾幹 (Émile Durkheim) 和帕森斯的社會學路徑來說，這無疑是對的；但與此同時，楊氏的落腳點卻是旨在通過研究宗教去理解中國社會。確實，楊氏之所以被中國學者看重，主要是其對中國宗教的獨到觀察。但是，如果我們將此書與楊氏的其他著作進行並置考察的話，就會發現，事實上對他來說，「社會」可能是一個比「宗教」更重要的詞彙。

楊慶堃在導論中明確指出，他的「最基本的目的是對一些重要事實作出功能性解釋，以便展示宗教和社會秩序的關係模式。」(頁19) 一些學者的評論文章也注意到這一點，例如，儘管何蓉的一篇文章主要是介紹《中國社會中的宗教》的基本觀點，但其標題〈從另一個視角看中國社會〉則隱晦地表達了對於楊氏寫作目的的體會，並準確地指出，「〔楊氏的〕著作也稱得上是從宗教的視角來觀察從家庭、社會團體、社區一直到國家層次或結構的中國社會。」(何蓉：〈從另一個視角看中國社會〉，《中華讀書報》，2007年9月28日，第10版。) 金耀基和范麗珠則在該書序言：〈研究中國宗教的社會學範式——楊慶堃眼中的中國社會宗教〉中特別指出，楊氏的貢獻「絕不僅僅局限於其對中國宗教的研究，而是集中在中國家庭和農村社區以及儒家傳統」，就算是在《中國社會中的宗教》一書中，楊氏所闡釋的也遠不止於中國宗教，「實際上所研究和描述的是中國社會和宗教的整合」(頁1)。

事實上，如果我們觀察和檢視楊慶堃的學術生涯及主要學術著作，就不難發現中國社會似乎才是楊氏根本關注的所在。他的諸多作品基本上都是從經濟、政治、家庭等角度分析中國社會，而《中國社會中的宗教》一書雖然是以宗教為題的研究，然而讀其通篇的話，也不難發現該書仍然是以認識中國社會為依歸的。

另一個相關的佐證是在楊慶堃去逝次年，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美國匹茲堡大學亞洲研究計劃及廣州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在香港中

文大學聯合舉辦了一場楊慶堃教授紀念研討會(2000年)，主題則被定為「社會學與轉變中的中國社會」。在會上發表的三十三篇論文中，有六篇是直接關於楊氏的研究，除了兩篇是對楊氏的生平和學術貢獻的總體評述以及楊氏的宗教研究之外，其他論文主要是討論楊氏在社會學的其他貢獻。

三 中國情懷中的(宗教)社會學研究

楊慶堃的《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固然是以宗教為中心而展開的，而且如前所述，是以理解社會為依歸的，但我們應該注意的是，他的研究，甚至包括他的所有學術活動(例如在費孝通的邀請下幫助中國重建社會學和社會人類學、幫助創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等)，都是出於一種深切的中國情懷。

數月前，筆者在上海從范麗珠教授手中接過新近出版的《中國社會中的宗教》中譯本，旋即通讀全書，期間不時為楊氏半個世紀之前的深刻洞見而動顏，也體會到以前閱讀英文本時未能觸及的一些細微之處。然而，更令人觸動的是楊氏對於中國命運的關懷。那種傳統知識份子「治國平天下」的情懷，似乎已經在1990年代以來的那一代學者當中逐漸被弱化和稀釋，甚至成為一些人的笑柄。但正是這種歷史的沉重感和對國家民族命運的牽掛，使得楊氏及其同代的「知識份子」與當下關注學問本身的「學者」之間出現了顯著的分野。從這個意義上，儘管筆者理解中譯本將原書最後一

從《中國社會中的宗教》這個題目上來看，似乎楊慶堃旨在通過研究宗教去理解中國社會。但是，如果我們將此書與楊氏的其他著作進行並置考察的話，就會發現，對他來說，「社會」可能是一個比「宗教」更重要的詞彙。

在楊氏那裏，對宗教的討論是在中國社會背景下完成的，最終的目標是要回答「中國怎麼辦」的問題。楊氏研究宗教，為的是認識中國社會，而對中國社會的精深理解則是為了解決「中國問題」。

章刪除的做法，也基本同意譯者在後記中指出「〔該章〕涉及的相關問題失去其解釋意義」的說法（頁338），但卻仍然頗為遺憾，因為這樣的刪節固然是「正確的」，但卻失去了讓讀者全面認識作者的機會。

前面提到，對於楊慶堃來說，「社會」乃是一個比「宗教」更為關鍵的術語。進一步，或許在楊氏那一代知識份子非常普遍的救國意識才是他內心深處最為重視的話題，換言之，「中國」才是楊氏所有研究和社會活動的終極歸因。簡言之，在楊氏那裏，對宗教的討論是在中國社會背景下完成的，最終的目標是要回答「中國怎麼辦」的問題。也就是說，楊氏研究宗教，為的是認識中國社會，而對中國社會的精深理解則是為了解決「中國問題」。

在2000年紀念楊慶堃的研討會上提交的論文中，霍爾茨納 (Burkart Holzner) 提到，在楊氏看來，社會學對於中國现代化的道路是關鍵性的。他甚至還提出，楊氏後來在中國社會學重建過程中的努力，可以被視為「為了现代化的社會學」(sociology for modernization)，而不是「關於现代化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modernization)。他如此寫道：「旨在幫助中國现代化的社會學，儘管其來源是西方經驗基礎上的社會學，仍然可以成為中國的一個本土性的事業，並能幫助中國解決在社會轉型過程中需要解答的問題。」(Burkart Holzner, "C. K. Yang: Sociology in China and the Encounter of Civilizations", in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 K. Yang and the Concept of Institutional Diffusion*, ed. Wenfang Tang and Burkart Holzner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7], 28.)

四 結 語

與費孝通相似，楊慶堃既有入讀私塾而獲得傳統經典知識的背景，也有就讀燕京大學並留學海外受西學(社會學)系統訓練的經歷。如果說楊氏所處的轉型時代以及傳統中國知識份子的「治國」情結，使得其所有的研究和學術活動塗上了一層厚重的救國色彩，那麼西學(社會學)的訓練則為他提供了解析中國社會的理論和方法工具。另外，他對中國經典知識的熟悉也使他對中國文化有着一般西方學者所無法觸及的「作為內部人」的體認，而這種深層的理解具體則表現為他對於歷史材料的廣泛掌握以及深邃的洞察力。在這個意義上說，楊氏對於普通社會學的另一項或許沒怎麼得到注意和承認的貢獻則在於，他對中國社會(以及其中的宗教)的研究對於社會學的恢復和發展其歷史向度，提供了一個令人信服的中國研究案例。

相信很多人都注意到，楊慶堃選用了一個比較長的副標題：「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與其歷史因素之研究」。他在導論中也指出，「中國文化之根延伸到過去，要理解現在的結構和功能地位要求對歷史淵源和發展脈絡尋根究底。」(頁35)楊氏近半個世紀之前的這個觀點對於所有試圖認識中國社會、但在其研究中重現狀而輕歷史的人來說，仍是一個必要的提醒，即缺乏對於歷史意義的理解，就無法真正把握這個社會的豐富性和複雜性。